作者高罗佩实在是个传奇人物，不仅是出色的汉学家，同时还反过来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流行文化。他所翻译及续写的《狄公案》与后来流行一时的“神探狄仁杰”的形象莫不有极大之关系。高罗佩的汉学功底是极深厚的，不仅能翻译文言，也能自撰文言文（《秘戏图考》中文序），对于诸多中国古代典籍的引用与理解令人惊叹。

本书是对中国古代性与社会历史的考察，在写作的当时乃是一片未开拓之地，高罗佩的开创无疑是成果丰硕的。遗憾的是，本应是自家故事的领域，至今尚未出现有分量的后继者，作者“海内识者，如有补其阙遗，并续之以明末以后之作，固所企盼”的愿望仍旧不见有实现的希望。

虽然作者分析道，明以前中国社会房中术的流行以及性的开放是由于儒家的信条尚未全面渗透进人们的日常，但其实，所谓“儒家”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始终一致的，儒家的文化鼎盛、最具有活力的时候，性的观念的同样是开放的，其间具有相关性。并非儒家思想的保守成为了主流，而是保守的观念侵占了儒家的理论。作者在本书中所未着笔的清代，是三千年来性最为压抑的时候，但明开始的趋势，至清才成形的所谓“传统”，竟被今人误以为一直如此（“从来如此，便对吗？”，当然不对，而且并不从来如此），中国人对“中国”的不了解到了这般！

文化的兴盛与观念上的开放（相对于压抑的保守而言）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疑问随之而来，为何文明的衰退中后期常伴随着思想上的自我压抑。这或许可以用生理学中的“代偿”概念作解，当机体无法在所有机能正常运转的前提之下保证核心功能（如与“生存”直接相关的）的实现，于是选择牺牲相对而言不那么“重要”的器官或机能，留下资源以供核心。那么同样的情形也会出现在以“不正常”手段试图实现现有情形一般不可为之事（“与天奋斗其乐无穷”）时。如此说来，“性”的思想也能成为观察一个社会是否健康发展的量尺之一。这大概部分的说明了，为何高罗佩的研究在作者离世半个多世纪之后，尚且是“后不见来者”。